



中國 傳統倫理思想史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主編 朱貽庭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主编 朱贻庭

撰稿 朱贻庭 张善城

翁金墩 江万秀

顾问 张岱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

朱 贻 庭 主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地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装璜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 / 32 印张: 17.75 字数: 460千字

1994年7月第一版 1994年7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6,001—9,000本

ISBN7—5617—0327—9 / K · 032 定价: 15.40元

序

冯 契

近几年来，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几种专著。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许多同志之所以热衷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正是因为看到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人们正经历着伦理价值观念的剧烈变革，所以迫切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总结历史规律和吸取历史教训，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变革的借鉴。

由朱贻庭同志主编的集体著作《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诞生的。我读了这本书的大部分原稿，感到各章的作者都力求站在现实的高度来回顾历史，因而使本书具有较强的现实感，读后发人深省。这无疑是一个优点。同时，作者也不满足于对历史仅作归纳和描述的水平，而努力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进行具体分析，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揭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这种对特点和规律的理论探讨，在“绪论”中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并贯串于全书之中，因此使得本书比较好地体现了

“史”与“论”的结合。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优点。此外，本书的作者都是大学教师，他们根据亲身的教学经验来编写这本书，写得条理分明，行文流畅，比较适合青年人的需要。它既是一本教材，也是一本具有可读性的知识性读物。我以为，它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的。

讲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大家便自然联想到历史遗产(包括传统道德与伦理学说)的批判与继承问题。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从五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为此争论不休。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首先需要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或历史遗产有些什么民族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本书对如何考察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民族特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需从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着手：一方面，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的长期存在，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而在非常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的统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面向“人道”，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思考的重点，使道德观与宇宙观、认识论交织一体，形成所谓“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以这两方面的结合作为观察问题的视角，本书作者提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若干具体特点，如人道(仁爱)精神屈从于宗法等级关系(“爱有差等”)，把“必然之理”(天道)与“当然之则”(人道)合而为一，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与“义利之辨”上的道义论成为伦理学说的主流，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与重视道德修养论，等等。这些具体特点的概括是否精当、全备，这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我以为，采取上述观察问题的视角，正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表现，这是许多同志都会首肯

的。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结构分为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个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①马克思说的最初形态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第二阶段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在社会历史的第一阶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始终以“人的依赖关系”(从自然发生的脐带关系演变而来的宗法制以及封建等级制)为其基础，它所维护的纲常名教后来便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严重地束缚着商品经济和人的独立性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从一些阻挠改革、开放的保守思想中，还常常可以窥见那和自然经济与“人的依赖关系”相联系着的伦理价值观念。可见从理论上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作分析批判的工作，还需要深入地进行下去。

但是，批判并不是简单地说个“不”字，而是要从辩证法的意义上来扬弃它：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虽然在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物质的和精神的)“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

^①《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着”，但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能力以及它所创造的文化已经积累得相当可观，这是后人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文化包括着道德与伦理思想，而伦理思想就是人们的道德生活与道德品质的理论表现。我们常说中国人具有勤劳、智慧、勇敢的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等，这种优秀的传统如何反映在伦理学说中，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例如，虽然小农经济有其极大局限性，但在农村公社解体以后，小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土地)保持统一的主要形式。正是这种统一，激发了劳动兴趣，培养了劳动技能和劳动习惯，逐渐形成中国人民的勤劳美德，而在某些思想家那里(如墨子、王充等)勤劳便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这种可贵的传统观念，在克服了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还需要继续加以发扬。又如，封建专制主义当然必须彻底清除，但同时也应看到，正由于中华民族早已建成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长期的共同生活方式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使中国人养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保卫祖国和发展民族优良传统，早就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和伦理的重要准则之一，这在某些思想家那里(如明清之际的黄、顾、王等)也得到了理论的表现。这种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在清除了封建的杂质(如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心理)之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需要继续加以发扬的。

所以，对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思想应作辩证的历史的分析。而这也正是思想史和哲学史本身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从天人关系来论人性，为其伦理学说提供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据，但这里面也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分。封建时代的正统派儒家，从董仲舒

到程朱，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规范——纲常名教形而上学化，把它们说成是超历史的存在，称之为“天命”、“天理”；而转过来，“天命之谓性”、“性即理”，出于人性的纲常教义即人道，当然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这种独断论的“天人合一”的伦理学说，后来成了“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以理杀人”的软刀子。这正如老子早说过的：“慧智出，有大伪。”“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但是，不能因此而引导到道德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去，也不能因此一般地否定“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辩证法的天人合一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王夫之发挥了“继善成性”说，把人性看作是不断地(自强不息地)接受自然的赋予而“日生则日成”的过程。他说：“色声味之受我也以道，吾之受之也以性。吾授色声味也以性，色声味之授我也各以其道”。就是说，客观事物的色声等感性性质给予我以“道”(客观规律与当然之则)，我接受和择取了“道”而使“性”日生日成；我通过感性活动而使“性”得以显现，具有色声等性质的客观事物各以其“道”(不同的途径和规律)而使人的“性”对象化了。这一性与天道交互作用的理论，充满辩证法的光辉，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性论的重要成就。如果把它安置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就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方面不断地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凭着人化的自然(为我之物)，不断地发展人的本质力量(人性)。正是在这种天与人的交互作用中，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奔向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

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

以上所说，也无非是以社会结构和哲学传统两者的结合作为观察问题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读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书稿后，促使我对如何把握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和如何批判与继承历史遗产的问题作了一点思考，产生了一点感想。朱贻庭同志早就约我为本书写一篇序言，我只好把这点感想写下来，聊以塞责。

一九八八年一月

绪 论

张岱年 朱贻庭

在中国思想史中，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一直从属于中国哲学史体系之中，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固守这种格局，束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也无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也由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需要，以及总结历史道德遗产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人们正越来越感到建立中国伦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下面，就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基本特点，谈一谈我们的一些初步看法。

一 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一) 把握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学科特殊性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德问题是哲学思考的重点，致使宇宙观、认识论和道德观交融一体，密不可分。因此，十分自然，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伦理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代替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呢？不能。伦理学与哲学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它以道德生活为对象，是人们对道德生活认识的理论概括和理论论证，包括道德的根源和本质、道德与利益、道德的准则，以及道德的作用、评价、修养等各种理论问题。伦理思想史就是历史上各种伦理思想辩证运动的历史总结。上述各种问题的历史就是伦理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对象。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这些问题各有其特殊表现形式，如天道与人道（“天人之际”）、人性与善恶、德与法、知与行、志与功，以及义利之辨、理欲之辨等等，其中有些问题虽也是哲学讨论的问题，但它们的理论意义不尽相同，有的则纯属伦理学的问题。所以，只局限于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围内的论述，就不可能对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中国伦理思想丰富的内容及其发展规律。可见，要使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与中国哲学史区别开来，把握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学科特殊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割裂开来，撇开哲学思想去孤立研究伦理思想，正如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必须考察

伦理思想一样，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必须研究哲学思想对伦理思想的影响。不然的话，就不能如实地反映中国历史上伦理思想的原貌及其理论特点。毫无疑问，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要十分重视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要把握伦理思想史的学科特殊性，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这就是：在古代伦理思想史上，是否如哲学史一样，也贯串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否也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就伦理思想史上的主要问题看来，其中有些问题具有哲学意义，如道德的根源、人性的本质，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对此可以作哲学性质的判断。但还有许多问题，如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什么是至善等，这些问题同样是伦理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但是它们的理论性质却不能用哲学基本问题去概括。因此，我们很难把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也说成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其次，就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来看，几乎找不到一种典型的唯物主义理论。不能认为凡是唯物主义者的伦理思想，就是唯物主义的；旧唯物主义一旦涉及到社会历史领域，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他们虽然力图把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道德领域，因而与唯心主义者有别，但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区别自然与社会的本质，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因而对道德的根源、人性的本质等问题就不能作出唯物主义的解决，有的虽然含有唯物主义的倾向或因素，或在个别问题(如动机与效果的关系)上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从总体来说，不能归结为唯物主义，即使象费尔巴哈那样的唯物

主义者，在道德领域中也陷入了唯心主义。可见，在伦理思想史中，一定要说象哲学史一样贯串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无助于把握伦理思想史的学科特殊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中，不必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对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作理论分析。我们的看法是，应该对伦理思想史上具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二)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结合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不过，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历史和作为理论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历史，它们运用这一方法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尽管两者的目的都要达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作为理论的社会科学研究历史，例如马克思的“商品”理论，在《资本论》中，商品的历史已经摆脱了原有的历史具体形式和偶然因素，因而表现为经过修正了的理论的逻辑形式。而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历史，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历史学来说，它的任务是要如实地反映历史的具体过程，因而它并不清除掉具体的历史形式，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在这里不是表现为抽象的理论结构，而是寓于具体的历史形式的摹绘，或者说，在摹绘具体的历史形式中体现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的规律。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就应按照历史学研究的特点，具体地运用历史的和逻辑的相结合的方法。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每一个比较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几乎都涉及到了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不同学派对

各个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形成了各伦理思想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运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中国伦理思想史，就是要把握各种伦理思想历史发展的根据(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以及各种理论问题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进而具体考察围绕着各种理论问题而展开的各学派之间的斗争，对各个伦理思想体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把握它们的基本概念和相互分歧的实质，看它们在斗争中是怎样演变和发展的，从中揭示出逻辑的联系和发展的规律。这里，最基本的是分析各种伦理思想及其相互斗争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析社会根源，最根本的当然是要考察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级关系。但经济关系并不直接决定伦理思想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因而还必须探究沟通这两者关系的中间环节。在中国古代，宗法关系和等级关系的存在和演变，对于伦理思想的影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即所谓文化区的特点，对于历史上各具特色的伦理思想派别的形成，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而学派自身的思想特色，又往往作为一种既定的力量制约着某种伦理思想的延续。在分析社会根源的基础上，还必须考察思想根源。首先是分析各种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即分析伦理思想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的关系。其次，既要研究各种伦理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的变化，又要考察它们的思想渊源。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历史演变中，自先秦至宋元明清二千多年，其思想前后承继不绝如缕，后一阶段的思想都可以从前一阶段中找到它的思想来源，这就为把握思想发展的逻辑联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必

须考察各种伦理思想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斗争，相互吸取的复杂关系。这样，才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

总之，只有在考察各种伦理思想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其历史的逻辑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从而生动地摹绘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具体过程，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 政治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

运用这一方法，目的在于剖析历史上各种伦理思想的政治性质和理论实质，进而作出全面的正确评价。

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① 伦理思想是道德生活的理论概括，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也都是阶级的伦理思想，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研究伦理思想史就必须坚持政治分析的方法，考察各种伦理思想的阶级基础，发现它的阶级实质和政治性质。所谓“政治分析”，实即阶级分析。不过，由于阶级斗争总是集中地体现为政治斗争，而同一阶级内部也往往存在着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样左右着思想斗争。这就是我们运用“政治分析”这一术语的缘由。例如在先秦，孟子的伦理思想与韩非的伦理思想，同属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但两者却如“冰炭之不能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器”，势不两立。这是因为在同一阶级中有不同阶层之分，他们的政治倾向有别，因而所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尽相同，而思想家所受的文化陶冶和个人经历的区别，也是原因之一。还应看到，由于同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起的作用又有进步和保守、革命和反动的区别，它的伦理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政治性质也会发生质的变化。儒家伦理思想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它从产生、演变、发展到定型、僵化，就经历了一个由进步而逐渐走向反动的过程。从考察伦理思想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可见，历史上的伦理思想在政治上有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之分。凡是反映进步阶级利益的伦理思想，就是进步的和革命的；凡是反映没落、反动阶级利益的伦理思想，就是保守的和反动的。然而，事物是复杂的，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历史变革时期，会产生一些过渡性的或两重性的人物及其伦理思想，往往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这就需要实事求是，承认矛盾，正确地解释这种现象。这里，只抓住一面，以偏概全，是不足取的。

除了政治分析，还应有理论分析。只有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上的伦理思想作出全面的评价。这里的所谓理论分析，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对各种伦理思想进行理论上的剖析，分析它们的理论意义和理论实质，总结它们的理论经验和教训，发现它们在伦理思想史上的理论贡献，即在人类认识自身道德生活的历程上是否提供了合理的或真理性的思想成果。例如，孟子的性善论，就其对人性来源的主张，其理论性质显然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但是他对人

性作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规定，这比把人性说成就是人的生理本能，从而抹煞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要合理得多。荀子主张“性恶”，但同样把“有义”作为“人之所以为人者”的本质规定，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显然受了孟子的影响。孟、荀都没有对人的本质作出科学的认识，但他们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的问题，这在人类的自我认识过程中，应该说是—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伦理思想史是人类对自身道德生活认识的发展史，它与其它领域的认识史—样，也是人类认识史的一支，也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它的进步和发展，就是通过各种伦理思想提供合理的，具有真理性的思想成果而体现的，因此，理论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是片面的、错误的伦理思想，它也是人类道德认识的一个历史环节，也要通过理论分析，把握它的理论实质，总结它的理论教训。还应看到，在历史上，有些在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的伦理思想，在其体系中往往含有某些合理的思想成分。例如，先秦道家的伦理思想，主张“绝仁弃义”，无为自然，就包含有反对道德形式主义的合理因素。宋明理学的伦理思想，在道德修养的问题上，强调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也是应该肯定的。而这同样要求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

(四) 运用科学的比较法

在中国史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法，—般是指中西比较。这一方法，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一